

# 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创新理念与最新实践

李丹 夏文强 罗美<sup>①</sup>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 422 号, 邮编: 361005)

**摘要:** 当今时代, 全球气候危机日益加剧, 全球气候治理却深陷困境。为此, 中国主张创新全球气候治理的理念, 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共同但有区别的治理观, 从而改变过去那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方式, 并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跳出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 在实践层面, 中国则通过完善气候治理机制、发展绿色经济、倡导绿色消费、增加生态系统碳汇等措施积极开展国内气候治理, 通过全程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主动发挥全球气候治理引领作用、携手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展现大国担当, 从而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做出了独特贡献。

**关键词:** 全球气候治理, 气候治理困境,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D08)      **文献标识码:** (A)

习近平主席在 2021 年 11 月 1 日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致辞时提出: “当前, 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日益显现, 全球行动紧迫性持续上升。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sup>[1]</sup>从根本上看, 气候变化问题作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凸显的深刻体现, 预示了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方式出了问题。因此, 我们走出全球气候治理困境首要的就是转变人类认识自然的观念, 进而改变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共同但有区别的治理观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 中国在国内通过完善气候治理机制、发展绿色经济、倡导绿色消费、增加生态碳汇等方式增加自主贡献; 在国际上则全程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积极发挥全球气候治理引领作用, 并通过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展现大国担当。

## 一、全球气候治理的现实困境

全球气候治理之所以收效甚微, 主要原因是存在着诸如观念困境、发展困境、集体行动困境等现实困境。虽然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 罗马俱乐部的一些专家就警示人类要改变自己在地球上的活动方式, 70 年代, 联合国就生态危机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但从后来的发展看, 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路上越走越远,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呈现急剧上升态势。加之, 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主体从国家本位出发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 使得全球气候治理难以达成集体行动, 从而造成全球气候治理步履维艰。

### (一) 观念困境

观念引领行动, 相应的观念会产生相应的行动。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度来说, 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成为阻碍治理进程的重要因素。

首先, 认为人类可以征服自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史看, 人类同自然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与自然为一→畏惧自然→征服自然的阶段。只有到了第三个阶段, 人类与自然的冲突才凸显了出来, 因为这种征服是以一种野蛮掠夺自然的方式呈现的。特别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 人类凭借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首次在同自然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 这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开发自然的能力, 同时也加快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 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人类观念的深

<sup>①</sup>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项目编号: 17JZD002, 首席专家: 李丹)的阶段性成果。

刻转变,在以前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总是会引发人类的反思及对自然的畏惧,但现在不同了,人类开始认为能够战胜自然,能够应付来自自然的各种不确定性。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大气和海洋似乎无穷无尽,因此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它们能够吸收我们的废弃物,并且不会产生任何明显的恶果。”<sup>[2]</sup>由于“征服自然直接关联着人的物质需要和欲望”<sup>[3]</sup>,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在消费主义时代达到了顶峰,在这个意义上,全球气候治理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次,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随着科学理性在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中展现出了巨大的物质性力量,使得人类开始相信科学是万能的,却忽视了科学本身的有限理性。在科学万能这一观念的主导下,很多人否认存在全球气候危机,故也谈不上全球气候治理。在他们看来,地球生态系统既不会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人类也具备适应不断变化外部环境的能力。即使人们认识到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紧迫性,他们也坚持认为科技可以帮助人类解决全球气候危机,却不反思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当然了,科学技术是非常重要的解决方式,我们可以通过科技的进步加大清洁能源的利用率,从而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我们还可以对废弃物进行科学处理,但更重要的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改变人类认识自然的观念。科学技术的进步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但绝不能将之作为唯一根本的方式,

再次,认为全球气候危机与己无关。尽管气象学界、地球学家反复强调全球气候变化给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有的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得出自身受益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结论,于是不愿参与进全球气候治理中。例如全球气候变暖会促使高纬度地区的土地具有了开发的價值。当然,在全球气候危机中,我们看到有些区域似乎因全球气候变暖而受益,特别是处于高纬度地区的土地将具备开垦价值,这也可能弥补其它区域的损失。但是那种认为高纬度地区受益的看法因缺乏全球视野而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和局部的利益。从个人层面来看,虽然全球气候危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但人们的认知及视野所及也不会认为奢侈的生活方式将加速全球气候变暖,人们只会觉得生活方式只是个人的选择,更看不到个人的选择会对全球生态系统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毕竟,个体相对于全球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正是所有个体影响的叠加才造成了全球气候危机。

可见,全球气候治理虽然早已进入了人类的议事日程,但由于人类观念变迁本身所具有的滞后性,致使人类现有的观念还不能适应全球气候变化的治理要求。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征服观、科学崇拜主义、利己主义观念还在主导着人类的行为方式,使得一部分国家和个体消极应对全球气候危机。这为我们开展全球气候治理提出了一个现实要求,即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在于行动,行动的前提在于转变陈旧的观念。

## (二) 发展困境

气候变化问题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这也意味着现有的人类发展方式还存在很大不足。客观来看,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伴随着世界人口、经济与碳排放增长而持续上升,全球平均温度也随之逐渐升高。大气科学界早就明确提出,二氧化碳和甲烷等含碳温室气体浓度升高可通过辐射强迫引起气候变暖。“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是要限制化石能源的使用”<sup>[4]</sup>,然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建立起了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至少在目前看来,化石能源的使用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还会主导人类的发展,从而给全球气候治理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难题。

首先,发展不充分。发展不充分是指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还远远没有实现充分的发展,一个实现了充分发展的世界将不再存在当今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难题。那么,评判人类发展不充分的标准是什么呢?有一个比较抽象但也可能是唯一的评判标准——人类的幸福感、满足感。有的人可能会提出质疑,这一标准只可能和个体的内心体验有关。但我们做不到关切

每一个人类个体的幸福感、满足感，我们只能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评判。历史地看，人类从大自然中获取自我保存所必须的物质，随着人类获取物质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类文明呈现一个螺旋上升的趋势，生活于其中的人类个体对幸福的体验也是上升的，不过当今时代的人类明显没有体验到充分的幸福。由于人类的发展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这也意味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始终扮演着一个索取者的角色，即人类还将持续消耗地球资源和排放废弃物。现实地看，还有一种发展不充分则是指人类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条件下还没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其中包括大力推动能源转型和科技变革。

其次，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鸿沟，使得人类面临着艰巨的发展任务。当今时代广泛存在的全球发展赤字、全球治理赤字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不平衡。美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史的偶然原因开启并引导了全球化进程，进而获得了先发优势，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将处于一种明显不利的地位。原因在于：其一，发展中国家出于发展的目的对化石能源有着更为紧迫的需求；其二，发展中国家缺乏必要的资金、科技的支持来积极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然而，发展权是优先权，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发展的权利。

最后，资本逻辑主导全球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的全球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化。但资本的趋利性使其朝着利润最高的地方奔去，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只要能获取高利润就不会被放弃，而是不断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从而将高排放留在了地球上。同样是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资本不愿进入盈利空间小的环保领域，毋宁说资本更愿意插足盈利周期短的领域，而与全球气候治理紧密相关的新能源、高新技术领域往往投资大、投资周期长，致使全球气候治理缺少资金的支持。

总之，人类发展的必然性、局限性同全球气候治理的紧迫性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困境，意味着全球气候治理将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长期任务。

### （三）集体行动困境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曼瑟尔·奥尔森提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sup>[5]</sup>全球气候治理不同于国家内部气候治理。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主体是彼此独立的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国家由于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所以难以达成集体行动。

首先，个别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存在冲突。对于人类来说，每一个个体都有着自利的本能，无论是在自然状态下，还是在社会状态中，人类个体首先考虑的是他的自身利益。同时人又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共同利益客观存在于共同体中。从人的自利本能出发，个体加入到集体行动中是为了获取比在自己单独行动时更多的利益。如果共同利益正好与个别利益在同一个方向上，那么集体行动将会畅通无阻，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集体行动中的个体都想通过搭便车的形式获取更多的私利，利益冲突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不仅个体之间或产生利益冲突，个体利益同共同利益之间也存在冲突，使得共同利益受到损害。在某种程度上，越是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个别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差异越大。因为全球气候治理是一种需要所有国家、所有人类个体加入的超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其中个别利益同共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可想而知。

其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是第一要务，在这个意义上，发展中

国家对发展的需求超过了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短板,使得他们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中往往有心无力,这直接制约了发展中国家行动的有效性。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他们虽然有着较强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但他们不愿以牺牲自身发展水平和改变奢侈的生活方式的形式来减少高居不下的碳排放。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协商中试图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具体体现为指责发展中国家的化石能源使用比例较高,及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所谓“同等”原则下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最后,全球气候治理存在权威缺乏。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现实障碍,权威的缺乏将始终伴随着全球治理,气候治理也不例外而且更甚。从现实来看,联合国及其与气候治理相关的国际组织只是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一个协商的平台,至于在全球气候治理协商中产生的相关决议、协定、方案能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就不得而知了。由于权威的缺乏,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主体还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决定加入或退出全球气候治理协商,例如美国在特朗普任期时公然退出了《巴黎协定》,拜登上任以后美国又重新回到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谈判桌上,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虽然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主体通过协商出台了相关的惩罚激励机制,但气候治理的全球协商性同民族国家的主权绝对性的矛盾很难得到改变。

总之,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各个国家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危机这一共同利益而联合在了一起,又为了各自的利益诉求而陷入了集体行动困境。不过我们也不必悲观,世界政府即使存在也不见得就有利于全球气候治理,人类最优秀的联合能力将可望解决集体行动困境。

## 二、中国通过创新理念积极引导全球气候治理

人类坚持错误的自然观导致了全球气候危机,同时又深陷短视的发展观及矛盾的治理观中难以开展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为此,中国通过创新理念积极引导全球气候治理,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共同但有区别的治理观。

### (一)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

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sup>[6]</sup>可以说,全球气候危机是现代性困境的重要内容之一。由西方开启的现代性实质上就是科学理性成为主宰人类的理念,在科学理性的主导下,人类不仅增强了在与自然相处过程中的生存能力,从而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态。然而,从全球气候危机的视角来看,科学理性虽然增加了人类在自然界的生存能力,从而使人类获得了舒适的生活,但这是建立在人类加大了对自然索取的基础之上。现在,全球气候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能够容纳人类排放废弃物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为了能够从根本上开展全球气候治理,我们就需要转变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我们不能再把自然当做可以征服的对象。在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当人类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当人类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也是无情的。我们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sup>[7]</sup>

首先,正确认识自然。客观来看,人是通过自我意识认识自然、世间万物及人类社会的。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个体难免会不自觉的将自己放在一个主体性的位置,其它被认识的对象就处于客体地位。因此,自然是被人类认识的客观对象,是与人的自我意识相对的客观存在,当人类在与自然的较量中占据上风的时候就很容易将自然当做被征服的对象。但是人的自我

意识完全可以跳出封闭的“我”，将人、自然、万物放在同一的客观地位进行认识，即庄子所讲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依然在被人类认识，但人类不再把自然当做可以征服的对象。

其次，正确对待自然。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从自然中获取维持生存所需的物质，不同的物种都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适合自身的最优生存模式。如果哪一种生物不能做到因自然环境的变动而适时顺应自然，其下场就只能是走向灭绝。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与其它物种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人类可以改造自然，从而让自身可以更好的适应自然。人类从科学的进步中获得的的就是改造自然的能力，但人类一定要防止自身因科学进步而滋生出对自然的傲慢，因为人类只能改造自然，却不能违背自然，更不可能主宰自然。

最后，正确对待生命。这是一个关于如何认识自己和幸福的问题。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使人类生活的更好。可以认为全球气候危机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人类从自然中获取越来越多的生存资料，并向自然中排放越来越多的废弃物，而全球气候治理之所以陷入困境则源于人类在追求物质的路上越走越远。相比于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所体验过的物质匮乏之感，消费主义时代的人类已经实现了物质的自足，（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极端贫困更多的属于分配领域的问题）但消费主义时代的人类却成了物化的人，被物所奴役，距离真正的幸福反而远了。

总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论转向，是人类在观念领域的大变革。“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sup>[7]</sup>

## （二）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

面对全球气候危机，“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人类不能再忽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警告，沿着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的老路走下去。”<sup>[8]</sup>因此，各个国家应该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即“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sup>[9]</sup>

首先，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这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全球气候治理与人类发展不可偏废；其二，全球气候治理的紧迫性与人类发展的必然性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在第一个层面上，各个国家既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又不能以牺牲人类的发展权为代价来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从全球来看，当今时代的人类虽然取得了物质生产领域的极大进步，但人类在分配领域的成就始终乏善可陈，这也客观造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鸿沟。因此，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上的穷人来说发展权是第一位的，这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没有人有权利剥夺它。在第二个层面上，我们要从过去那种发展经济就意味着更多的碳排放的旧观念中走出来。在经济学意义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增长需要扣除环境成本，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环境成本无法用单纯的数字来衡量。在新发展观下，各个国家要兼顾到全球气候治理的紧迫性与人类发展的必然性。实际上，全球气候危机也只能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得到合理地解决。客观来看，绿水青山是验证全球气候治理是否有效的体现，金山银山是满足普通民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基础，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增光添彩，金山银山为绿水青山提供保障。

其次，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这揭示了人类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之间深刻的矛盾。“近年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

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sup>[6]</sup>如果说人类可以在现有的发展水平上很好地生存的话，那么放任全球气候危机继续恶化的后果就是降低人类生活质量甚至加速走向自我毁灭。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没有了绿水青山的金山银山都是毫无意义的，呼不到洁净的空气、喝不上干净的水、看不见蓝天白云，坐拥金山银山又有什么意义呢？金山银山关系到人类物质条件的好坏，绿水青山则关系到人类能否永续生存。不过，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不要金山银山”也不意味着以牺牲发展为代价来换取“绿水青山”，更不能像一些极端的环保主义者那样鼓励人类回到物质匮乏的原始时期。

最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道出了生态保护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辩证地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朴素的真理。我们要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摒弃以牺牲环境换取一时发展的短视做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我们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sup>[7]</sup>因此，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并不是不要发展，而是怎样发展；并不是只讲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而是要寻求既能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又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sup>[10]</sup>

### （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治理观

全球气候治理之所以陷入集体行动困境，主要原因是各个国家在国家利己主义的推动下一心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甚至会将自身的利益建立在牺牲其它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更不用说会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动了。例如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总统就经常公然在世界舞台上宣称“美国优先”“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容置疑”等不负责任的言论。美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将近15%，如果任由美国不加节制的持续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世界各国都将深受其害。这就要求各个国家通过协商形成全球气候治理新体系。为此，中国主张“各国应该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国情和能力，最大程度强化行动。”<sup>[11]</sup>

首先，各个国家共同承担全球气候治理责任。面对全球气候危机，不是哪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单独应对，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需要各个国家和民族一道共同应对，所谓共同但有区别的治理原则中的“共同”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共同，即全球气候危机在覆盖面上是全人类，其解决路径也只能是全人类共同应对。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主体来说，共同行动是前提。首要的应该是在关于全球气候危机及全球气候治理的认识上形成价值共识，很明显，在无知之幕后，没有人希望全球气候危机继续恶化，人类只会想到要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各个国家一定要摒弃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的“搭便车”心理，如果每个国家都希望其它国家履行更多的减排责任，而自己却什么也不做，全球气候治理也将会是一个空中楼阁。

其次，发达国家应该承担历史性责任与援助性责任。全球气候危机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路上愈走愈远，而这一征服自然的过程是以大规模加速开采地球资源和向地球排放大量废弃物为标志的。很明显，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进程中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开采权，并持续向地球排放了更多的温室气体，是全球气候危机的罪魁祸首。因此需要追究他们的历史性责任。发达国家不仅是全球气候危机的罪魁祸首，而且在今天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上依旧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这就要求发达国家需要承担更多的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包括历史性责任及与它们的人均排放量相匹配的责任。同时，发达国家有着更强的开展全球气候治理的能力，包括充足的资金和先进的科技及人才等优势。从全

球气候治理的视角出发，发达国家应该跳出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和资本逻辑，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气候治理援助。

最后，发展中国家应积极承担差异性责任与自主性责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是历史过往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是当今时代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都要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客观存在着发展水平比较低的现实，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往往缺乏资金、技术、人才等各方面的支持，这也导致发展中国家无力承担更多的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因此，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原因都表明发展中国家都只能承担差异性责任。不过，差异性责任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继续肆无忌惮的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某种意义上，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发展中阶段，因此发展中国家能否开展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关系到全球气候治理的成败。这要求发展中国家要主动承担起自主性责任。全球气候治理不仅事关全人类的生存，更直接关系到发展中国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发展中国家不能因为能力有限就不努力提升自身的能力。总之，“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石。我们要充分肯定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所作贡献，照顾其特殊困难和关切。发达国家应该展现更大雄心和行动，同时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韧性，为发展中国家提高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避免设置绿色贸易壁垒，帮助他们加速绿色低碳转型。”<sup>[6]</sup>

#### （四）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严峻和紧迫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气候治理成为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出现的少数最受全球瞩目、影响极为深远的议题，作为全球治理变革的一面“镜子”和“旗帜”，气候治理考验着各国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总体方案、整体目标，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创新治理理念的基本要求，也是指导思想。气候变化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产物，因此要坚持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气候问题是地球生命面临的共同挑战，因此要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重构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气候治理是影响和决定当前及未来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构国与国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坚持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是自然的产物，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但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关系被打破，人为了满足自身不断膨胀的物欲，疯狂掠夺自然、破坏自然，这是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源。近年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触发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中国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这是全球气候治理应秉持的基本态度理念。

坚持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地球是人类的家园，也是所有动植物的家园，人类与地球，与地球上的万物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大家共生共存，相互依赖。由于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高智商物种，为了让自身的栖息更舒适、生活更美好，剥夺、破坏、影响了其他动植物的生存。美丽的信物、优雅的装饰、高贵的皮草背后是滴血的钻石、带血的象牙、流血的动物。人类正在为自己的自私、贪恋和虚荣付出代价、遭到抱负。“万物各得其所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失去动植物的依傍和依托，人类便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地球上的生命是一体，只有相依为命，相互爱惜，才能共同生存。

坚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包括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也包括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海洋生命共同体。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自应对、独善其身。世界各国应该加强团结、推进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如果每个国家都想搭便车，都想让别国承担责任，自己坐享其成，坐收渔利，气候治理永远也不会奏效，气候变化只会越来越糟。

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明确提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sup>[7]</sup>，这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发展与环保关系、各国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指导思想，为全球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明确了方向和路径。

### 三、中国通过最新实践大力推进全球气候治理

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践行者。在国内层面，“中国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是关键，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sup>[11]</sup>在国际层面，中国不仅全程参与了全球气候治理协商，而且勇于担当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角色，还通过共建“绿色丝路”创新气候治理实践。

#### （一）在国内层面：积极提高国家自主减排力度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一是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建设。2019 年以来，中国政府不断推动立法和标准制定、推进绿色制度建设、加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在推动立法和标准制定方面，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相关性研究，进一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草案，研究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标准体系。2021 年 1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提供支撑，建设美丽中国。在推进绿色制度建设方面，中国政府有序推动绿色金融、气候投融资、完善税收政策支持、制定绿色产品认证、标准。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立足于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市场定价三大功能，持续推动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和国际合作取得积极成效。生态环境部会同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会同银保监会修订《绿色融资统计表》中涉及低碳经济、气候融资的有关内容。2019 年 4 月，财政部会同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公告》。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了人造板和木质地板、涂料、卫生陶瓷等 18 项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在全面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面，2020 年 12 月，生态环境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提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引领绿色低碳发展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2021 年 4 月，发改委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对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发展强化了支持，在绿色债券中剔除了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等高碳排放项目。“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sup>[7]</sup>

二是推动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

体现，也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遵循。中国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顺应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抓住绿色转型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以创新为驱动，大力推进经济、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实现绿色复苏发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sup>[12]</sup> 在实践中，中国政府通过实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加快形成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优化调整能源结构、强化能源节约与能效提升、推动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积极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等等方式，积极发展绿色经济，从而为应对气候变化做自主贡献。具体来看，第一，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中国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第二，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必须尊重自然，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第三，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第四，中国持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扩张，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化解过剩产能。第五，能源领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中国不断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第六，为进一步强化节约能源和提升能效目标责任落实，中国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设定省级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控制目标并进行监督考核。第七，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把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第八，中国积极探索低碳发展模式，鼓励地方、行业、企业因地制宜探索低碳发展路径，在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开展绿色低碳相关试点示范，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低碳试点体系。从而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促进经济绿色转型。

三是倡导绿色消费。全球气候变化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的开发，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最后又是以被人类消费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就是说，各国要想真正开展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应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消费方式，即绿色消费。“我们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拒绝奢华和浪费，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要倡导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让生态环保思想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sup>[13]</sup> 在实践中，中国政府一方面促进绿色产品消费，另一方面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2021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促进绿色产品消费，坚决制止餐饮浪费，因地制宜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推进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在绿色产品消费方面，加大政府绿色采购力度，扩大绿色产品采购范围，逐步将绿色采购制度扩展至国有企业。加强对企业和居民采购绿色产品的引导，鼓励地方采取补贴、积分奖励等方式促进绿色消费。推动电商平台设立绿色产品销售专区。加强绿色产品和服务认证管理，完善认证机构信用监管机制。推广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引领全社会提升绿色电力消费。在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方面，因地制宜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开展宣传、培训和成效评估。扎实推进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推进过度包装治理，推动生产经营者遵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提升交通系统智能化水平，积极引导绿色出行。2019年全国公交电动化从2015年的20%已经提高到了2019年的60%，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2020年交通部发布《绿色出行创建行动方案》，提出将60%的创建城市绿色出行比例提高到70%以上；财政部出台《关于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的公告》，在2021年和2022年两年期间对新能源汽车免收购置税。2021年多省发布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政策，如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做大，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提倡推广新能源汽车的使用量。

四是增加生态系统碳汇。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一过程可以

通过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即控制源头,同时也可以通过增加生态系统碳汇即吸纳温室气体的方式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此,中国坚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发挥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土壤、动土等的作用。根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2010年至2020年,中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约1.08亿亩。“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6.37亿亩。2020年底,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3.04%,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到56.1%,湿地保护率达到50%以上,森林植被碳储备量91.86亿吨,“地球之肺”发挥了重要的碳汇价值。“十三五”期间,中国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1097.8万公顷,完成石漠化治理面积165万公顷,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塞罕坝、库布齐等创造了一个个“荒漠变绿洲”的绿色传奇;修复退化湿地46.74万公顷,新增湿地面积20.26万公顷。截至2020年底,中国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74处,面积超过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亿亩,整治修复岸线1200公里,滨海湿地2.3万公顷,生态系统碳汇功能得到有效保护。

总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已经在气候治理领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成为了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为建设人类共有的绿色家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二) 在国际层面: 积极促进全球气候治理

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是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建设的关键。习近平主席指出,“在气候变化挑战面前,人类命运与共,单边主义没有出路。我们只有坚持多边主义,讲团结、促合作,才能互利共赢,福泽各国人民。”<sup>[1]</sup>习近平主席为加强全球气候治理提出了中国方案,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一是中国全程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实地看,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也经历了角色的转变。1972年,中国参加了由联合国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并在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上签字,开始与世界各国一道探索应对环境的问题。1979年,中国派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1988年,中国参与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并参加了由IPCC组织召开的历次会议。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国于1992年11月7日经全国人大批准该公约,并于1993年11月5日将批准书交存联合国秘书处。1994年3月2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从1995年起,缔约方每年召开缔约方会议以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中国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中国参与达成《京都议定书》,2009年促进达成《哥本哈根议定书》,2015年引导推动《巴黎协定》。特别是在《巴黎协定》的达成、签署、生效及落实过程中,中国都发挥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受到了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和称赞。为推动《巴黎协定》全面落实,中国确定了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的自主行动目标。中国的自主贡献目标为各方共同努力全面落实《巴黎协定》和各国自主贡献承诺奠定了主基调。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决定前后,习近平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多个场合重申了中国将与各方同心协力、共同坚守《巴黎协定》成果、共同推动《巴黎协定》实施的坚强决心,向世界释放出中国将坚定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百分之百承担自己义务、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信号,及时巩固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决心,充分展示了中国“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角色与形象。

二是中国主动发挥全球气候治理引领作用。从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历程来看,欧盟在最

初的京都会议中扮演了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角色,美国则在哥本哈根会议以后接替欧盟主导了全球气候治理,不过,美西方国家在领导全球气候治理期间一心只顾自身的一亩三分地,他们不仅逃避减排责任,还转移污染,不主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已经失去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信任与支持。为此,中国提出全球气候治理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以谋求全人类共同利益为目标。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坚持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严格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达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切实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向前发展。中国推动发起建立了“基础四国”部长级会议和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等多边磋商机制,积极协调“基础四国”“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立场,为维护发展中国家团结、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以理念和实践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新格局,逐步站到了全球气候治理舞台的中央。<sup>[14]</sup>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说,“中国现在致力于向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深入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当今世界需要中国这样负责任的国家在全球生态环境议题中发挥引领作用。”<sup>[15]</sup>在中国主动提出“双碳”目标后,日本、加拿大、韩国等发达国家也相继提出碳中和时间表。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所要付出的努力也将远远大于这些国家,体现了中国领导全球气候治理责任担当和构建地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决心。

三是中国自觉开展共建绿色丝绸之路行动。发展优先、行动导向是中国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一带一路”是践行这些理念的平台,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绿色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底色,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的公共产品。2017年4月24日,中国政府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时指出:“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是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推动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实践。绿色发展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是顺应和引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国际潮流的必然选择,是增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动力的有效途径。”<sup>[16]</sup>绿色“一带一路”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注重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始终从发展的视角看问题,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项目选择、实施、管理的方方面面。我们要致力于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为发展中国家营造更多发展机遇和空间,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sup>[17]</sup>“一带一路”沿线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科技落后、资金短缺的困境,脆弱的生态系统、落后的经济社会现实使之需要承受更为沉重的来自气候危机的影响。中方秉持“授人以渔”理念,通过多种形式的南南务实合作,尽己所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从非洲的气候遥感卫星,到东南亚的低碳示范区,再到小岛国的节能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成果看得见、摸得着、有实效。<sup>[6]</sup>截至2021年底,中国与28个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覆盖40多个国家的150余家中外方伙伴;“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纳入100多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相关数据,120多个国家的环境官员、研究学者和技术人员2000余人次参加了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实施“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斯塔克说,绿色“一带一路”带给世界的最大好处,就是工业的进步和低碳能源生产成本的降低,整个世界都将从中受益。<sup>[18]</sup>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致辞 [N]. 人民日报, 2021-11-2 (1).
- [2] 彼得·辛格. 如何看待全球化 [M]. 沈沉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29.
- [3] 张盾. 马克思与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12).
- [4] 陈红彦. 自由贸易协定: 提升我国全球气候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新路径 [J]. 法学, 2020 (2).
- [5] 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 [M]. 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2.
- [6]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4-23 (2).
- [7] 习近平. 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10-13 (2).
- [8] 习近平. 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0-9-23 (3).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21.
- [10] 耿步健. 论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整体性逻辑 [J]. 探索, 2021 (3).
- [11] 习近平. 继往开来, 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新征程——在气候雄心峰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0-12-13 (2).
- [12]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N]. 人民日报, 2021-10-28 (14).
- [1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75.
- [14]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N]. 人民日报, 2021-10-28 (14).
- [15] 刘毅. 大国担当! 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 [N]. 人民日报, 2018-6-13 (1).
- [16] 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的建设的指导意见 [EB/OL]. [http://www.mee.gov.cn/gkml/hbb/bwj/201705/t20170505\\_413602.htm](http://www.mee.gov.cn/gkml/hbb/bwj/201705/t20170505_413602.htm).
- [1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493.
- [18] 刘玲玲等.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N]. 人民日报, 2021-12-24 (3).

## China's Innovative Concept and Latest Practice of Leading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Li Dan Xia Wenqiang Luo Mei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 Fujian, 361005)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lobal climate crisis is intensifying, but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is in deep trouble. To this end, China advocates innovating the concept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that is, adhering to the natural view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development view that green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golden mountains and silver mountains, and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so as to change the extensive development mode at the expense of the environment in the past, and jump out of the narrow perspective of nation-state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In practice, China is actively carrying out domestic climate governance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climate control mechanism, developing green economy, promoting green consumption and increasing ecosystem carbon sequestration. It participates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process and takes the leading role to promote the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and jointly builds green "Belt and Road" to show responsibilities of great power by actions. Thus, China contributes its ideas and practi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and natural life.

**Keywords:**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climate governance dilemma, the community of human and natural life, "The Belt and Road"

作者简介：李丹，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全球化与中国外交方面的研究。夏文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罗美，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